



# 海外赤子的艰险归国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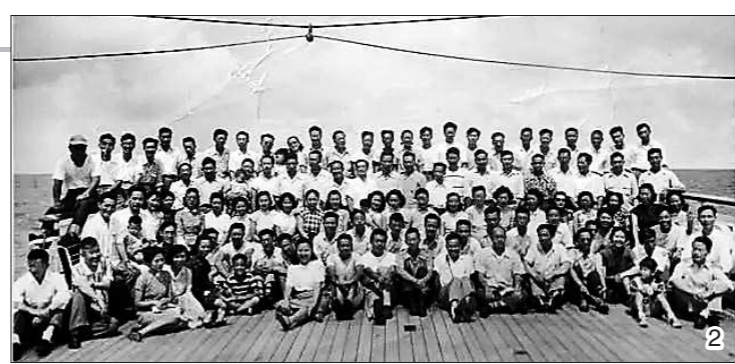
——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外留学人员归国掠影 李红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临行前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郭沫若给远在英国的李四光带了一封信,邀请他早日回国。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回到祖国,李四光选择一条“曲线回国”的线路——他只身从英国到法国,再辗转回到瑞士北部边境城市巴塞尔,这才通知妻子、女儿从英国剑桥来到瑞士汇合。最终在新中国政府的帮助下,在意大利热那亚乘坐客轮,于1950年5月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从英国出发前,李四光寄出一封信,坦荡昂扬地表达心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夜思慕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已经启程返国。”

李四光来到北京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便去他的住处看望。得益于李四光的回国,新中国开始了地质事业的全面发展。



1.周恩来(右)与李四光亲切交谈  
2.1950年9月18日,“威尔逊总统号”邮轮抵达香港时,邓稼先等留美归国人员在甲板上集体合影  
3.1950年7月19日,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寄往美国的航空信件  
4.1950年11月,沈善炯、罗时钧、赵忠尧(自左至右)在日本蒙难被释放后合影



## “祖国需要你们”

1949年11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不久,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专门发函给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新华社驻布拉格分社社长吴文焘,指示他们,“李四光先生已秘密离英赴欧,准备返回,请你们设法与之接触。并先向捷克当局交涉,给李以入境便利,并予以保护。”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恢复经济亟须技术人才。1949年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热情地向海外知识分子发出“祖国需要你们”的号召,表达了对海外人才的渴望和尊重,并代表新中国政府邀请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海外知识分子回国参加建设。

据统计,当时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及已就业的教授、学者共有7000人。分布在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家。为了有效争取留学生回国,1949年12月6日,我国成立了第一个办理海外知识分子回国事宜的文化教育委员会——“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设置了调查组、招待组和工作分配组等职能部门,作为留学生回国事务的领导机构,统一领导有关留学生回国事宜。其主要任务:一是调查尚在国外的留学生,动员其早日回国;二是对留学生回国前后进行宣传、了解及教育;三是负责留学生回国后的招待;四是统筹解决回国留学生的生活和工作。1950年“办委会”在全国一些大城市都设立了回国留学生招待所,负责招待回国后的留学生和知识分子,并且和教育部合作,给海外留学人员寄送《人民中国》等书籍,让海外留学人员了解新中国。

为了补助留学生回国的费用,1950年10月“办委会”制订了《回国留学生招待办法》(对接接国外留学生回国旅费暂行办法)两项规定,提出了“接济旅费的七项原则”。针对留学生的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留学生国内经济来源断绝,回国后可以设法归还者,借给他们回国所需的旅费;留学生经济困难,无力筹措旅费,回国后亦无力偿还,可以申请补助;与留学生一起在国外的家属,如确有需要,亦可酌予接济。

很多海外归来者在回国时缺乏入境证,“办委会”马上给这些在外人员各发出一份中英文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欢迎你及所有中国留学生回到自己的祖国,参加建设工作,为人民服务。你们可由任何地方进入国境,不需要入境证。但你们如携带任何足以说明你们留学生身份的文件,则更能享受到许多便利。”

广州作为留学生返回国门的第一站,地理位置特别重要。1951年11月9日,中央教育部就留学生回国入境问题与广东文教厅规定:那些与我国没有建立邦交的国家,归国的学生只要具有足以证明自己是留学生身份的文件,都可入境;那些未持有证明的留学生,问清楚来由,酌情处理。就途经广州的海外留学生旅膳方面的问题,规定了火车待遇、分房原则及伙食标准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对海外知识分子归国工作,有着比较细致周密的安排。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后,不仅衣食住行可以得到照顾,在招待期间还组织参观、游览、举行晚会等活动。考虑这批回国人员急于参加工作的需求,要求对他们的分工分配“应当力求迅速,要简化分配工作中的手续”,尽快让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对留学回国人员的伴侣工作问题、子女读书问题,回国之后的落户问题以及良好的居住环境等均尽力加以落实解决。

1956年9月,为了吸引更多的海外学子回国,周恩来提议成立“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成立分会。一年后,周恩来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留学生家属联谊会,在会议上恳切地说,留学人员回国后所学到的东西不一定能够全部用上,设备也不见得全,帮手也可能不够……我们要谅解他们的生活和处境的困难,更不应该去增加他们的困难。最后,周恩来宣布:政府对于留学生回国,不管先后我们都一律欢迎,一视同仁,而且允许来去自由。现在国外的留学生想回来看看再出去,是可以的,已经回国的愿意出去,也可以。

这一系列政策,犹如一颗定心丸,缓解了海外留学生的疑虑;周恩来总理的真诚言语,温暖了海外留学生和家属的内心。

## 梁园虽好,归去来兮!

1949年夏天,中共南方局安排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徐鸣专程回国,他在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时,周恩来就指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

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学子赴西方先进国家留学的热潮迭起。二战期间,因欧洲受战争破坏严重,日、德是敌对国,学生、学者

们都选择去美国留学。抗战胜利后,以“讲学、考察、参观”等方式出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也与日俱增。这批留美人员总数超过5000人,主要集中在美国东部和中部的大学。1948年底,国民政府停止向留学生提供“官价外汇”,这使得公派生失去了经济来源。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曾一度依据移民法对许多留学生的海外留学生旅膳方面的问题,规定了火车待遇、分房原则及伙食标准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对海外知识分子归国工作,有着比较细致周密的安排。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后,不仅衣食住行可以得到照顾,在招待期间还组织参观、游览、举行晚会等活动。考虑这批回国人员急于参加工作的需求,要求对他们的分工分配“应当力求迅速,要简化分配工作中的手续”,尽快让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对留学回国人员的伴侣工作问题、子女读书问题,回国之后的落户问题以及良好的居住环境等均尽力加以落实解决。

一时间,滞留在美国境内的中国留学生处于困窘状态,找工作非常困难,行动受到约束与监视。身处异乡,留学学子深感“异乡人”的苦闷,民族自尊心异常强烈。钱学森的博士生、留美学专家郑敏哲曾说:“那时留学生是听不进坏消息的,只要有人说中国不好,我们这些中国人就一定要跟他顶牛。这种感情是原来的文化培养出来的,无法逃避。”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让海外学者为之振奋,回国效力,与家人团聚成为海外留学生回国的内在驱动力。

早在1945年,周恩来在重庆就建议成立进步科学家团体“中国科协”,之后陆续成立“留美科协”“留英科协”“留法科协”等,这些实际上是“中国科协”的海外分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协”向海外各分会发出号召:“诸学友有专长,思想进步,政府方面盼能火速回国,参加工作;我们谨此向你们伸出热情的手,欢迎你们早日归来,共同为人民服务,为我们新中国的生产和文化建设而努力。”

1949年6月底,东自纽约,西至西雅图,“留美科协”已成立了13个分会和10个学术小组,会员发展到340余人。“留美科协”由徐鸣和薛葆鼎组织管理,其主要工作不仅给回国的会员提供服务,并且动员非会员回国。“留美科协”以召开讨论会、座谈会、学术报告会,出版《留美科协通讯》等方式,宣传新中国的政策。1950年暑假,美国东部与中西部夏令会以“建设一个新中国”为主题召开。当时《华侨日报》的负责人唐明照给留美学生介绍新中国的政策,解答了留学生的疑惑和关心的问题,进一步提振了留学生回国的决心。据1950年第6期《留美科协通讯》登载的旧金山湾区会员讨论回国问题的记录,大多数留美学生

都以“祖国建设需要我”为行动口号表示愿意回国,关键问题在于什么时候回去,以及怎样把自己的所学同国家建设的发展结合起来。

“我这次回国,完全是凭着我的良心,新中国是大家的,建设新中国是我们大家的事情,因此我决定早日回去,尽我的能力为建设中国而工作。”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留美科协”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说出肺腑之言。华罗庚时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终身教授,1950年初他以到英国讲学为名给全家人弄到船票,他毅然舍弃了洋房、汽车和半年的薪水,带领妻儿4人在旧金山登上一艘邮轮,踏上了归国旅途。2月,华罗庚一家到达香港。他在香港发表了一封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爱国之心:

朋友们:  
不一一道别,我先诸位而回去了。千言万语,但愧无生花之笔来一一地表达出来。但我敢说,这信中充满着真挚的感情,一字一句都是由衷吐出来的。

坦白地说,这信中所说的是我这一年来思想斗争的结果。朋友们,如果你们有同样的苦闷,这封信可以做你们决策的参考……

中国是在迅速地进步着,一九四九年的胜利,比一年前人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快得多。在一九五〇年,我们将比一九四九年好得多的条件,因此,我们所得到的成绩,也会比我们现在所预料的更大些、更快些。

在信中,华罗庚真切地呼唤: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  
3月11日,新华社播发了这封信,这在留学生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一时间,要求回国的海外留学人员倍增。

## 带回先进设备和一脑袋的知识

新中国成立前夕,整个中国的科研机构只有四十多个,科研人员不到1000人,科技成果寥寥无几,新型学科近乎空白。有些海外回国的知识分子甚至冒生命危险从国外携带所需的科研设备回国。

1950年8月底,赵忠尧和邓稼先、涂光炽、庄逢甘、鲍文奎等近一百余名留学人员踏上归国行程。临行前,他和鲍文奎商定,冒险把经典加速器的图纸、真空管的零件放在鲍文奎的行李箱里。由于鲍不是学原子弹的,所以当他们登上“威尔逊总统号”邮轮时,鲍文奎是相对安全的,行李也没有

受到严格的检查,从而顺利地将科研设备带回祖国。当邮轮抵达日本横滨时,赵忠尧、罗时钧、沈善炯等三人(罗为生物化学博士,沈是航空工程博士、钱学森的弟子)被要求携带行李从三等舱到头等舱接受检查。此后,三人便被押送下船,上岸讯问,遭到扣押。经中国政府的交涉,约两个月后,赵忠尧等人方得以途经香港,回到了祖国。

与赵忠尧同船回国的邓稼先,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当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邓稼先说:“我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带回先进设备和一脑袋的知识,这是海外留学人员的赤子之心!

20世纪50年代,从美国回国有抵欧坐火车和乘船两种方式。乘船一般由旧金山上船途经檀香山、横滨、马尼拉、香港、天津方可到达北京。而且只能乘总统轮船公司的船,别的轮船公司一概不给办理,并且还要达到规定的人数才能办理过港签证。乘火车要经过欧洲、东欧到苏联西伯利亚,然后南下入中国境,最后到北京。乘火车需要取得途经国家的过境签证,到莫斯科后再到中国驻苏使馆把原来的旧护照换成新中国的护照。因此,不论是乘火车、乘船,回国途中需约二十至六十天的时间。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的曹日昌教授(中共党员)处是“中国科协”同“美国科协”的一个联络站,接待并介绍了许多旅外科技专家取道香港回来。政治封锁阻挡不了海外留学生的归国热情,一路流离颠簸,但海外留学人员回国的心情却是自豪激动的。

1951年,30岁的谢希德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即以赴英国结婚为理由,申请离开美国。在英国剑桥,她与夫君曹天钦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1952年8月底,他们告别剑桥,登上“广州”号海轮离开英国,经过苏伊士运河、印度、新加坡、中国香港到达深圳。离深圳码头还有几十米了,我听到了岸上扩音器传出雄壮的歌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心中激起翻腾的波涛。这次从美国回国,汽车和半年的薪水,带领妻儿4人在旧金山登上一艘邮轮,踏上了归国旅途。2月,华罗庚一家到达香港。他在香港发表了一封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爱国之心:

朋友们:  
不一一道别,我先诸位而回去了。千言万语,但愧无生花之笔来一一地表达出来。但我敢说,这信中充满着真挚的感情,一字一句都是由衷吐出来的。

坦白地说,这信中所说的是我这一年来思想斗争的结果。朋友们,如果你们有同样的苦闷,这封信可以做你们决策的参考……

中国是在迅速地进步着,一九四九年的胜利,比一年前人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快得多。在一九五〇年,我们将比一九四九年好得多的条件,因此,我们所得到的成绩,也会比我们现在所预料的更大些、更快些。

在信中,华罗庚真切地呼唤: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  
3月11日,新华社播发了这封信,这在留学生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一时间,要求回国的海外留学人员倍增。

## 后记

“赶快回去,从头做起……无论被驱在祖国的哪一角,我将爱惜那卑微的一份,步步真诚地做,即使国内情况更糟,我仍愿回来。”画家吴冠中先生的感言,道出了海外留学人员的心声。他们抛弃了欧美国家舒适的生活条件,与当时经济还很困难的祖国患难与共,不计得失,胸怀理想。

新中国成立前后,有相当数量的海外留学人员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从世界各地辗转归来。回国后,尽管遭遇了各种困难,但他们仍然不忘回国,在科技创新、人才队伍的建设上默默奉献终身,他们的贡献将永远镌刻在新中国的丰碑上。



## 解秋日报 消费市场 专版

- 刊登内容
- 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 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 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
  -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

电话: 021-22898552

## 住进了延安的医院

林达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给彻底镇住了,一时间呆呆地站在房子的走廊上,睁大了她的眼睛,十分焦急地看着我问,他怎么突然就病得住院了?走的时候什么事也没有,怎么一到延安就这样了?

我说,具体我不是很清楚,但他肯定病得不轻。

林达仍然呆呆地站着,好像我刚才给她说的事情,她根本没有听清楚一样,也不去给我找路遥的换洗衣服,但她的脸色非常难看。过了一会,她才断断续续地给我说,你去了延安告诉路遥,家里的事不要他操心,让他安心地治病,等病好了再回来。

我说,我一定会把你的意思转告给他。这样说着,林达这才匆匆走进路遥的书房,我也跟着她走进,找他那些换洗衣服。可是路遥很乱,而林达也好像不经常到这个房间里来,她几乎在房间里什么东西也找不到,胡乱找了好一阵,才找到几件路遥的衣服。然后她急急忙忙地出去,在她住的房间里找来了一个手提塑料袋,把路遥的衣服叠好,放在她拿的那个手提塑料袋里。

我提着手提塑料袋刚准备离开他家,林达却让我等一下,她用颤抖的声调叮嘱我说,你去了延安,看他到底病得严重不严重,如果延安不行,你让他赶紧回西安来治疗,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死要面子活受罪。

我看着林达,给她点了点头,就下楼去了。

我回到我的房间里,把装路遥衣服的手提袋放在床上,然后把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精装本一捆一捆地打开,一套一套地配



## 路遥的时间

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

航宇 著

齐,放在了我的床上。这些书都是路遥从出版社买回来的,准备送给他的一些朋友。据版成给我交代,路遥让我去延安的时候,想办法给他带10套《平凡的世界》,他要签名送给帮助他的那些延安的朋友和医护人员。

我害怕遗漏下路遥需要的任何东西,便在房子里把东西一一清点清楚,看还有什么东西没带。我这么一清点,行李还真不少,仅10套精装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是30本。我得把这些东西全部归纳在一起,这样方便我上下火车。

8月15日早晨,我提着他的换洗衣服和10套《平凡的世界》精装本,在作协的大门口搭了一辆出租车,赶到西安火车站,乘火车去了延安。下午7时左右,我就到了延安火车站。

此时,天色慢慢黑了,在延安火车站不远处,具有标志性的宝塔山,处在隐隐约约的朦胧中,而延安火车站的广场上,却是灯火辉煌,一片通明。

我在火车站广场搭乘了一辆通往市里的小型面包车,直接赶往延安地区人民医院。延安火车站到地区人民医院不是很远,如果不是堵车,十几分钟就到了。在地区人民医院大门口下了车,我提着一个沉甸甸的纸箱朝传染科走去。然而到了传染科的

门口,却怎么也进不去。一位姑娘紧紧把着传染科的门,把我毫不客气地挡在门外,我该怎么给她解释都不行,而她却像审犯人一样,问我有没有进门证。

我说,我刚从西安坐火车来延安,哪有进门证?

没有呀?没有你就不能进去,这是医院的规定。那姑娘看了我一眼,也不管我汗水淋漓抱着一个纸箱站在传染科的门口,她却拿着一本书,专注地看起来。

我实在有些支撑不住了,把沉重的纸箱放在传染科的门口,伸展了一下我有些酸痛的腰,揩了一把汗,想给看门的姑娘说两句好话,可看门的姑娘铁面无私,非常严厉地质问我,谁让你把纸箱放在这里了,你不看一看这不是不是你放纸箱的地方?她毫不客气地让我把纸箱马上拿走,并数落了我几句,别想从这里混进去,连门也没有,像你这样装可怜的人,我见多了。

哎呀,我没想到在延安遇到这么大的麻烦,我可进不去怎么办?没想到一个地区的人民医院却管理得这么严格。这时,我看见进出传染科的人少了,便笑着对那姑娘说,你能不能让我进去?

绝对不能。那姑娘看也不看我一眼地

说,如果你想进去也可以,得给我拿进门证。我焦急地说,你让我去哪里拿这个进门证?

哪里拿那是你的事,跟我没一点关系。那姑娘这样对我说,我是按规定办事,见证人。

好话我给姑娘说了一大堆,可她根本不听。因此我有些生气,便对那看门的姑娘说,我没进门证可以进去,你能不能给我把一个人叫出来,让他来拿东西。

那姑娘看见我生气的样子,便问我,你这么大的口气,想让我进去给你叫谁?

我说,路遥,你知道吗?他是著名作家,你一个小姑娘,还能想得上天呀。我之所以这样说,觉得自己到了延安,就等于回到了家一样,如果是在西安人家这样拦我不让进,我可没法有什么好办法。

然而,那姑娘一听我说路遥,突然像触电了一般从凳子上站起来,甚至有些埋怨我说,你看你怎么样一个人,为什么不早说你是去看路遥。

我说,给你说说看路遥,你就让我进去?那姑娘说,看门的姑娘说,路遥那么有名,陕北谁不知道他是个大作家,只要你去看他,我就让你进去。

看来,路遥的名字就是一个进门证。看门的姑娘知道我是看路遥的人,她的态度一下下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仅同意让我进去,而且还要亲自带着我见路遥。

我想,这姑娘绝对是路遥的一个崇拜者。她笑容满面地把我从传染科楼巷里带过去,走到紧挨传染科医生和护士办公室旁的一间病房,我跟前,扭头看了我一眼,一把推开了门,大声喊叫说:路老师,你看谁来了?

路遥听看门的姑娘这一声喊叫,把侧躺在病床上的身体转过来,看见是我,惊讶地说,哎呀,是你来了。